

司法证明结构微观考察

——构建协同的司法证明模式

□ 戚婵

【摘要】在倡导诉讼模式转变和司法改革的今天,司法证明结构的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因为司法证明结构的设计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司法程序的运作是否顺畅,当事人的权益是否保护到位。而与协同的诉讼模式相配套,司法证明模式也应当相应地向协同模式靠拢,以构建一套微观合理的诉讼程序理念和司法证明结构。

【关键词】司法证明 微观结构 诉讼模式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司法证明的微观结构

从微观视角来看,证明主体、证明客体和证明手段各自都有自身的结构。相对于司法证明的宏观结构来说,司法证明诸要素的内部结构可以称之为司法证明的亚结构。证明亚结构是司法证明的次级结构,也会对司法证明功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证明主体亚结构。从证明亚结构来看,大陆法系认证主体的一元化结构与英美法系认证主体的二元化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而我国则实际上存在认证主体的多元化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的认证主体结构比较简单,英美法系国家的主体结构相对复杂,涉及两个认证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相应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证明规则也要比大陆法系国家复杂得多。从源头上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并非为了实现司法证明的功能而创设的,换言之,英美证明制度的生成,陪审团制度是因,司法证明模式是果。由于陪审团制度的存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制定了完备的证据筛选规则。在通常情况下,只要证据在来源、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证据就不应该被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筛选阶段,法官需要事先将不可采的证据或者虽然可采但可能误导陪审团的证据予以排除。这样的做法或缩小陪审团所接触的证据范围,使之看到的证据有时不足以帮助其作出判断。

从两大法系主体结构的比较来看,大陆法系的认证主体一元化结构似乎是更为理性的证明结构形态。在一元化结构中,作为认证方的职业法官和陪审员能够与举证方、质证方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保障司法证明功能的实现。我国不存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在主体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接近。然而,在实践层面上,我国的诉讼模式接近于大陆法系,但是我国司法证明的认证主体与大陆法系的一元化结构有些

许不同,是一种多元化结构。

模式之所以得以界定,实际上就是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的平衡结果,二者正是司法证明的两大基本元素。^①多元化的认证主体结构形态与我国的司法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在司法上实行“法院独立”审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所以,如果我们把法院看作是认证主体,那么,可以说我国的认证主体是一元化的;而如果把相关人员分别看作认证主体,则我国的认证主体是多元化的。

模式之所以得以界定,实际上就是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的平衡结果,二者正是司法证明的两大基本元素。多元化的认证主体结构形态与我国的司法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在司法上实行“法院独立”审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所以,如果我们把法院看作是认证主体,那么,可以说我国的认证主体是一元化的;而如果把相关人员分别看作认证主体,则我国的认证主体是多元化的。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的审判组织形式有三种,即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其中审判委员会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组织,只负责对经独任庭或合议庭审理,因案件重大、疑难、复杂而难以作出判决的案件进行处理。并且,其对案件的处理不采取开庭的方式,而是采取会议的方式,在审判委员会委员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交由原审审判组织执行。所以,我们不妨把审判委员会看做是凌驾于独任庭或者合议庭之上的一个机构,其负责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作出最终的裁判。此外,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经独任庭或者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在作出判决前一般还需要经过内部报批程序,即由审判庭将初拟的判决意见报请主管庭长审批,之后再报请主管院长审批。在经过这样的审批程序后,才能作出判决并公开宣判。

我国这种独特的主体结构形态与两大法系均有较大的差



异。多元化主体结构的优势在于,案件经过层层把关,有助于确保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特别是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其正确性的严谨把握可以更好地避免发生错案。然而,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司法证明,这种结构形态却是弊大于利的。原因是尽管庭长、院长以及审判委员会委员通常都有着丰富的审判经验,但是,以司法证明的一般经验来取代司法证明个案中的特殊规律却是不可取的,存在类似于法定证据制度的简单、机械等弊病。

司法证明的三方结构在构造设计上具有天然的过滤功能,它能够将任何一方导入系统的不合法证据或者提出的不当推理和论证方式予以排除或者否定,从而使三方证明主体的行为整合为一种促进事实发现的“合力”,促进司法证明系统功能的实现。然而,英美法系陪审团与证明当事人之间只存在单向的信息传递,而不存在双向的互动,我国作为法定认证主体的审判委员会以及实践中参与司法证明活动的庭长、院长等主体则与证明当事人之间毫无互动可言。司法证明的本质是证明主体相互之间以及证明主体与证明客体、证明手段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多元化的认证主体结构存在的显著问题主要表现在,除庭审法官之外的庭长、院长以及审判委员会委员等主体并不亲自参与法庭审理,所以既没有与举证方和质证方之间的互动,也没有与证明客体、证明手段之间的互动。

证明客体亚结构。证据不能等同于证明信息,但是抛开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每一个证据都可以抽象为一种信息,使法官获得需要的知识。总体而言,案件事实通常由不同的要件事实构成,而要件事实的认定又往往有赖于若干中间事实经由综合而得出的推论,这就是证明客体的亚结构。从证据性事实到中间事实,再到要件事实和案件事实,证明客体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即证明推理是沿着证据性事实→中间事实→要件事实→案件事实的路径展现其结构的。证明客体亚结构是比较复杂的,有时要件事实可以直接用证据来加以证明,而无需中间事实;有时要件事实必须通过中间事实才能得到证明;有时要件事实不能仅仅通过一个中间事实,而是通过几个中间事实的组合,甚至通过几个中间事实相互衔接的推理来证明要件事实。但不论属于何种情况,所有的中间事实、要件事实之间都必须协调一致,否则就不足以形成严密的证明体系。

证明手段亚结构。从证明手段的角度来看,司法证明的过程是以证明规则为大前提,以证明信息为小前提的推理过程。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法庭科学规则以及法律拟制规则等证明规则是把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结起来的桥梁。司法证明规则的运用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环节:一是适用逻辑法则、经验法则以及法庭科学规则的自然推理环节;二是适用法律拟制规则的法律推理环节。

在司法证明过程中,这四种证明规则不是可以等量齐观

的,其适用有着一定的优先次序。逻辑法则、经验法则和法庭科学规则三种证明规则在适用上的优先次序为:逻辑法则为最优先适用,次序高于经验法则和法庭科学规则,法庭科学规则优于经验法则。

简单表述,即在适用优先程度上可以这样体现:逻辑法则>法庭科学规则>经验法则。这一次序是依据这些证明规则在推理形式上的确定性程度来排列的,逻辑法则优于法庭科学规则是因为法庭科学规则也非终极真理,不符合逻辑法则的法庭科学规则是不可靠的;而法庭科学规则优于经验法则是因为法庭科学规则是经验法则的高级阶段,比一般的经验法则更为可靠。当然,“社会科学证据(即此处的法庭科学规则,笔者注)的可采性取决于其自身的科学性,而科学性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应当允许被怀疑,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也应当允许被怀疑。”^②与前三证明规则无法相提并论的是法律拟制规则。法律拟制规则只在自然推理手段已经用尽,而案件事实依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法律拟制规则是证明规则的最后选择。

诚然,如此排列次序是就司法证明的最后环节即事实认定阶段而言的,而在此前的证据筛选阶段则涉及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出于政策上的特殊考虑,立法者可能将某些虽然能够保障事实发现,但可能侵犯其他重要利益的证据排除在司法证明系统之外。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品格证据规则就旨在防止陪审团受到误导,而证人特权规则旨在维系某些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有优先适用更为可靠的证明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事实发现等证明功能的实现。

司法证明结构的协同优化

威格摩尔在其著述中将证据法学研究区分为司法证明和证据可采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注重证据推理过程,而后者主要针对法律创制的程序性规则,也即动态的证明理论与静态的证据规则。^③从证明功能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系的竞争模式与大陆法系的探知模式各有千秋。英美法系的竞争模式证明当事人的参与程度较高,因此说服论证功能较之大陆法系更强,能够更好地吸收当事人的不满,使司法民主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这一模式在事实发现方面的功能不是很好。从利益平衡功能来看,由于法官只能处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竞争模式在保障司法证明的形式公正方面比较突出,却难以保障司法证明的结果公正。有学者认为,竞争模式就认定事实问题而言,也许是相对糟糕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审判法官所言:“我们关于频繁地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④

相较之下,由于司法证明进程主要由法官实施控制,当事

人的参与程度较低,因而,司法主体体现得不够充分,探知模式在说服论证功能方面比英美法系的竞争模式稍逊一筹。然而,探知模式在事实发现功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由裁判者本人亲自实施事实调查,更有助于裁判者本人形成确信。在利益平衡功能方面,由于法官对证明程序的控制可以将个案因证明主体证明能力差异而导致不公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做法无疑有助于平衡举证方与质证方的利益。当然,探知模式的正当性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对审前的证据收集活动与司法证明活动进行有效的阻隔,否则可能会导致法官先入为主形成不利于裁决的前见,反而不利于确定案件事实。

纠问式诉讼模式强调发现真实,对抗式诉讼模式注重保障人权,我国诉讼模式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尝试虽不能简单归类于二者之一,却更倾向于纠问式。^⑤可见,司法证明的理想模式应当综合两种模式的优势,尽量减少其负面效应,方能更好地为查明事实真相服务。

法官作为认证主体,其发挥的主导作用在任何证明模式下都是必要的。通常认为,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进程完全由当事人主导,实际上却不然。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从司法证明的启动、发展和终结来看,认证方实际上都是司法证明活动的主导者。没有法官的正确引导,就不可能实现司法证明活动的有序。虽然在竞争模式下,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职业法官消极、中立地做出的裁决却在司法证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英美法系对法官高资历的要求就可说明法官即使是在竞争模式下依然发挥着将领的重要作用。

认证方的主导作用对于发挥司法证明的利益平衡功能可谓至关重要。近年来,英美法系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加强认证方主导作用的必要性。事实调查的范围以及通过证据开示程序所得到的大量事实材料都提出了组织和协调的问题,都促使庭审法官在主导、组织和推进诉讼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目前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模式上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认证方对司法证明进程的控制力度强弱有别,控制力过强或者过弱都不利于司法证明功能的发挥,所以,科学地设计认证主体的主导方式具有必要性,对司法证明结构的优化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应当构建争论双方的良性竞争机制。根据心理学上的“叶克斯—多德逊定律”,行为人的动机激活水平所导致的心理压力对行为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产生阻碍作用。在简单的任务情境中,较高的动机水平会产生较好的行为效率;在复杂困难的任务环境中,较低的动机水平反而会提高行为效率,一般认为这是由于动机激活水平过强会使情绪扰乱认知活动所致。在诉讼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司法证明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活动,如果法官的动机过强,过多干预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质证,反而会降低诉讼效率。尽管认证方对司法证明

的主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片面强调认证方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争论双方的参与也是不可取的。在司法证明实践中,认证方过分积极反而不利于案件真相的发现。因此,构建争论双方的良性竞争机制,引导举证方与质证方共同促进真相的发现,是司法证明系统建构的理性选择。“寻求法之确定性造就了强大的司法证明体系和灿烂的诉讼法律文化,为诉讼带来了莫大的裨益;但是同时应当理性地认识到,过分追求明晰的诉讼传统也滋长了一种偏颇的观念,即认为用确定的逻辑与经验的推理等方式一定能做出对事实的真实描述,而排斥模糊手段抑或将其视为非科学方法。”^⑥诉讼程序诸多环节普遍存在着不确定和模糊现象,时刻提醒着人们不应该以死板的标准来衡量证据和打量当事人,在证明系统中,适当的模糊对当事人对方良性互动是有助益的。

综上所述,只有正确认识举证方、质证方与认证方在司法证明中的角色,恰当地协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在司法过程中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实现司法证明系统的自治,从而促进司法证明机构的协同化。

人民论坛

(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谢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样态、逻辑与转型”,《中国刑事杂志》,2013年第11期,第62页。

②汪祖兴,宋汉林:“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图景”,《现代法学》,2014年第3期,第174页。

③See John H. Wigmore: The Science of Judicial Proof: As Given by Logic, Psychology, and General Experience, and Illustrated in Judicial Trials. 3rd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7, p5.

④[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宋金娜、朱卫国、黄文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⑤韩艳:“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正本清源——以‘规范说’为理论基础”,《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第61页。

⑥栗峥:“司法证明模糊论”,《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45页。

责编/张晓